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三辑)

总主编/李玉明

徐继畲和他的《瀛寰志略》

殷俊玲 / 著

一位既不曾到过外国，也不懂得外国语言文字的清朝官员，竟靠着博览群书和细心访问，完成了一部世界历史地理巨著——《瀛寰志略》，被称为“中士言外志者之先河”，或许他的毅力比这部书更让我们敬佩。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复 审：石凌虚
终 审：杭海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继畲和他的《瀛寰志略》/殷俊玲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4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3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198-0

I. 徐… II. 殷… III. ①徐继畲一生平事迹②瀛寰志略—研究 IV. K8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458 号

徐继畲和他的《瀛寰志略》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3辑)

殷俊玲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1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

ISBN 7-203-04198-0
K · 205 定价：30.00 元(套)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申维辰	白 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领
张国祥	张捷夫	罗广德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三辑)

- 1 李渊父子晋阳起兵
- 2 王维
- 3 说五代话山西
- 4 一代清官姚天福
- 5 祖槐
- 6 漫话山西古建筑
- 7 徐继畲和他的《瀛寰志略》
- 8 毛主席在山西
- 9 彭德怀副总司令在太行的故事
- 10 刘胡兰

目 录

一、时代赋予的使命	(2)
二、主张“经世致用”	(6)
三、誓死抗击英国侵略	(10)
四、放眼世界，研究外国	(12)
五、展示世界，启迪国人	(15)
六、自强的主旋律	(19)
七、新一代思想家与《瀛寰志略》	(22)
八、求实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25)
九、教书生涯与再奉旨入京	(32)
十、中美友谊史上一页	(37)
十一、地理、历史学以外的学问	(39)
十二、结束语	(44)

引子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座纪念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纪念塔。塔高 550 米，高耸入云，用纯天然大理石建成，美丽、雄伟、壮观。纪念塔与美国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并列在一条直线上，与白宫遥遥相对，是美国首都的独特标志，也是著名的旅游胜景之一。进入塔内参观的人很多，有的年份游人竟达两亿以上。

纪念塔的内壁上砌有当时各国及美国各州所赠的铸文和石刻。引起游人尤其是华人特别注意的，是在塔的第 10 层内壁上嵌有一块清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1853 年 7 月 12 日）镌刻的长方形花岗岩中文碑，碑文是徐继畲所著《瀛寰志略》中颂扬华盛顿丰功伟绩的一段话。参观的人们对这块石碑特别感兴趣，有的称赞徐继畲渊博的地理历史知识，有的就这个问题大谈中美文化交流，也有的因为对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一书不甚了解，便很自然地提出各种疑问。

徐继畲（1795—1873 年），是清朝一位高级官吏，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先进思想家和爱国者。他所著的《瀛寰志略》一书是中国人研究世界地理历史的拓荒之作，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启蒙作品。其影响所及，不

仅有后来中国的思想界，而且还波及日本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他是山西五台县人，他的远见卓识值得山西人为之骄傲。

一、时代赋予的使命

清乾隆六十年（1795）冬季的一天，在山西五台县东冶镇，徐继畲降临人世。
从徐继畲的祖父起，徐家就是官宦之家。徐继畲的父亲徐润第，乾隆末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储济仓监督、施南府（今湖北恩施县）同知。他为官清廉，“生平一介不苟取，服官二十余年，衣不盈两笥”（*si*）。不仅如此，他的学问还非常渊博，生平潜心研究陆王之学和周易之学，都很有造诣。徐继畲的叔父徐寅第，嘉庆初年拔贡，曾任直隶省（河北省）肃宁等县知县、景州等州知州，是一位主张“勤可补拙，俭可养廉”的清官。徐继畲的母亲续氏，幼年曾熟读诗书，是一位明白事理的贤妻良母。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徐继畲受的自然是儒家的教育和熏陶。幼年在家，受母亲的启蒙，后来外出随父亲、叔父学习，受他们严格的言传和身教。

在家庭的苦心培育下，青少年时期的徐继畲，不仅博览群书，学问渊博扎实，而且有深厚的儒家道德修养。嘉庆十八年（1813），徐继畲应山西省乡试，考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凭借其扎实的儒学功底，又夺取了进士的桂冠。至此，徐继畲功名成就，就要走向社会了。然而，当

时的社会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翻开中国的历史，有时会发现使人最为惊奇的事。公元 1640 年，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按照一般规律，中国的发展应该和世界各国大致同步。但是，事物有时偏偏要违反人们的主观愿望。就在此后的 4 年，即 1644 年，中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满洲的铁骑进入中原大地，建立了一个集历代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经验之大成的、封建统治更加巩固的清帝国。从此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相比较，不仅由先进变成落后，而且越来越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迅速地走上了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时代。到公元 18 世纪末，英国就完成了技术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而同时的中国又如何呢？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统治，与中国以前的历史相比，中国确实出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在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也确实出现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由于中国封建统治的更加完善，由于清朝为巩固封建统治而采取了与世界隔绝的闭关政策，从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当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乘着资本主义的快车，迅速前进了；中国却由盛转衰，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到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相当于徐继畲出生的前后，英国工业城曼彻斯特林立的大机械工厂与中国一些城镇的小手工业作坊之间、欧洲大陆上轰鸣的火车与中国的牛车之间，西方海上行驶的大轮船与中国的

帆船之间，西方的新式大炮、毛瑟枪与中国大刀、长矛之间，形成了进步与落后、繁荣与衰败的鲜明对照。

在乾隆、嘉庆之交，一度强盛的清王朝，国力开始下降，并逐渐走进了衰世。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已经相当腐朽。文官不诚心办政，武官不认真操军，整个官场浑浑噩噩（è），士林风气也日趋败坏；吏治腐败，“官以贿得，刑以钱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便是清朝官吏贪赃枉法的真实写照。从表面看来，清帝国大厦的框架虽然没有什么大变化，而其内部却在日益腐烂着。

更为可悲的是，清统治者们看不清世界形势，当然也看不到中国的落后。他们不仅思想观念顽固守旧，而且虚骄成癖，妄自尊大。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只有清帝国是“天朝上国”，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这些国家与中国交往，只能是对清帝国“输诚向化”，向清朝皇帝进贡和朝拜。与这种自大骄矜观念相伴的，那就是愚昧无知。尽管他们把五经四书背得烂熟，他们的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却少得可怜，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也几乎等于零。问他们中国的地理位置，回答是“居大地之中央”，并说河南阳城（今登封县）是“大地之中心”。他们不知道也不相信世界分为五大洲，还认为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当1840年英国要进攻中国时，皇帝和大臣们还弄不清这个国家位于何方，有何来历。

妄自尊大与愚昧无知交织在一起，自然是不相信科学，排斥新鲜事物。封建统治者们把外国的科技产品一律看做是“奇技淫巧”，并予以摈弃。就在徐继畲出生前不久，一

位法国人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说”介绍到中国来，引起清统治者内部一片喧哗。在他们看来，太阳每日东出西落绕地球而行乃“天经地义”，哥白尼却说地球是绕太阳而行，完全是“动静倒置”，并组织官员们予以批判，就连著作等身的大学士阮元也写文章批判哥白尼之说是“离经叛道”。请注意，清朝官员们对哥白尼学说大动干戈的年头，距哥白尼学说的发表已逾 200 余年。这一学说在西方国家早已家喻户晓，对小学生来说都成了常识，而清朝的进士、翰林们还在那里大惊小怪，难道这不发人深思吗？

乾隆五十八年（1793），也就是徐继畲出生的前两年，英国派了一个以马嘎尔尼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带着英国的殖民使命来到中国。乾隆皇帝拒绝他们的侵略要求完全是正当的。但是当马嘎尔尼向大学士和珅谈及欧洲的一些科学发明时，和珅却态度冷淡，“一律傲然视之”。马嘎尔尼请清朝大将军福康安参观他们卫队佩带的新式手枪，这位曾经南征北战的大将军却“意颇冷淡”，说“这种火器，谅无甚稀罕”，不屑一顾。在这些人之后，比他们年轻的嘉庆皇帝看到外国的新式钟表时，说这不过是“玲巧之器”，应把它看做“粪土”，并且说中国百姓没有钟表照样可以晨起，可以种地。可见，他们排斥科学竟达到了何种程度！

封建小农经济是妄自尊大思想的经济基础，而妄自尊大的观念又是清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的思想根源。自清朝初期以来，在妄自尊大思想支配下，闭关政策到道光末年以前一直保持未变。闭关锁国，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到 1840 年鸦

片战争前夕，从科学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等方面来看，中国落后于西方，大概有两个多世纪。在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不论任何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在 19 世纪 30 年代，也就是徐继畲刚刚进入仕途不久，英国侵略者的魔爪就伸向了中国。他们先采取可耻的鸦片政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中国运销毒品。当这种政策遭到失败之后，便图穷匕首见，悍然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

上述种种，说明在徐继畲时代，历史向人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就是要反抗英国的侵略，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二是要冲破“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把中国推向近代化道路。当时，自觉抵抗英国侵略的颇不乏人，有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自觉地去执行历史赋予第二种使命的人，却是屈指可数的。徐继畲凭借他的正义感和忠于国家的观念，不仅具有反抗英国的坚强意志和行动，而且最早地觉悟到变革的必要性，进而研究世界，向国人介绍世界，从而站在了时代浪潮的尖端，挑起了唤起民族觉醒的重担。

二、主张“经世致用”

因为徐继畲是清朝官吏的一员，自幼又受的是儒家教育，所以对于现实，他首先觉察到的自然是清王朝因政治腐败而出现的危机。因此，如何整顿清朝统治，便成了他进入仕途之后，经常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道光十年（1830），徐继畲进入仕途。先任翰林院编修，继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从道光十八年（1838）到道光三十年（1850），除任广东按察使三个月外，其余的时间都在福建任职。先是做福建延津道道员，又调任汀漳龙道，再任福建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6）升任福建巡抚，成为清朝的封疆大吏。

有人说徐继畲一生为官清明廉洁，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只用“清明廉洁”四字，还不足以说明他为官的全部。从整体上来考察徐继畲为官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他属于当时清朝官吏中主张“经世致用”的经世派，那么，什么是经世派呢？

前面已经提及，自乾隆末期以来，清朝的统治已趋于腐朽，社会弊端丛生，进入衰世的警钟已经敲响了。这时，一部分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为了挽救清朝这幢即将倾倒的帝国大厦，坚持忠君爱民的民本主义，大力提倡清朝顾炎武等学者的“经世致用”学说。所谓“经世致用”，即在学风上既反对空洞无物，也反对烦琐考据，主张“以经术为治术”，研究古今的政治实际，提倡经世实学，解决实际问题；在政治上，主张清明廉洁，大力整顿吏治，革除一切弊政，解决国计民生的一切重要问题；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反抗外国侵略。当时提倡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陶澍、贺昌龄、王鼎等。尽管他们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实际上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政治派别，史学家们称他们为经世派。

徐继畲虽然与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们没有广泛深入的联

系，但他在踏进仕途之前，就是经世派理论的倡导者。道光十六年（1836），他在应顺天府会试中，朝考论题为“政在养民论”，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扎实的儒学功底，全面阐述了他的忠君爱民思想。他说，对待平民百姓应该是“制其田里、薄其赋税，经其礼俗，修其政教”，也就是对待百姓要施以仁政。他的这些论述，是对儒学民本主义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他曾写道，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的“元气”。民本思想是经世派思想的基础，也是徐继畲做官为政的指导思想。尽管这种思想仍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但却包含着有利于人民的因素。

徐继畲进入仕途之后，就像其他经世派官员一样，以整顿吏治，革除弊政为己任。他曾冒着极大的风险，大胆地揭露官吏的腐败。他说：州县之官，不是忙于钻营就是利用手段聚敛钱财。遇到灾情，他们不但不报，而且还继续大肆摊派，拿人命当儿戏。他还说，州县之官如此，即使钦差大臣下来，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方百计地袒护官吏。他揭露清朝的一些高级官吏的作风说：所谓有清名的大臣，实际是以“缄默不言”为谨慎，以不露头角为“深沉”，以“模棱两端”为“济事之道”，以“遵循故事”、顽固守旧为“奉公守法。”而这些人所上的奏章，“所敷陈似乎精密周详，万无遗憾，而实则铺张粉饰，纸上空谈，稽（考查）诸事实，则大谬不然”。在这里，徐继畲把那些昏庸无为的官员们的嘴脸，勾画得活灵活现，揭露得体无完肤。不仅如此，他还大胆地向皇帝发出警告说：“凡不知人间有清白吏”，以至于有些地方的农民卖儿卖女，

“壮者弃产奔逃，弱者填委沟壑”。据此，他认为目前已处于人心浮动，朝不保夕的局面，意思是说：人民要起来造反了！徐继畲对清朝弊政的揭露，固然是从维护清朝统治着想，但在字里行间中却时时流露出对百姓的同情。仍然

在对清朝弊政进行揭露的同时，徐继畲还多次上书要求设法予以整顿。他要求皇帝下旨，“痛除情面，力矢忠诚，斥乡勇之陋习，溯正直之遗风”。在整顿上，他主张从“实”字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如果处处能够实事求是，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道光十六年（1836），他上《政体宜崇简要疏》，认为古今治术，“开创之初，政令简要”。虽有疏漏之弊，但具体实在，但到后来，“法制周密，其病在烦琐，而虚文之患起”。这里所谈的“虚文之患”，就是把法制视为具文，出现令不行、禁不止的现象。所以他主张一切教令、条例、处分都应该简化，便以重振纲纪，实事求是地解决吏治中存在的问题。

徐继畲在自己为官实践中，廉洁奉公，关心民间疾苦，处理事情，都是从“实”字出发。道光十七年（1837），徐继畲出任福建延津道。此道共辖17县，大都是崇山峻岭之区，向来是盗匪横行之地，历届道员均未能治理，徐继畲到任后，立即摸清盗匪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捕盗办法，并致书各县，要求他们编练保甲，亲自督率所部，严加追捕。由于徐继畲实事求是，认真果断，不到一年的时间，盗匪肃清，百姓安居乐业，徐继畲也因此受到福建巡抚的召见和表扬。

徐继畲为官的主张和实践，和当时其他经世派的官员

几乎是异曲同工，大同小异，所以说，他属于主张整顿政治，但又非常注意解决国计民生中实际问题的经世派官员。

三、誓死抗击英国侵略

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徐继畲由延津道调到汀漳龙道任道员。这时，英国侵略军已经到达中国，并从广州沿海向北进攻。

由于英国把大量的鸦片输入到中国，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经济，损害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道光十九年（1839）初，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举起了严禁鸦片和抵抗英国侵略的大旗。当年6月，林则徐取得了缴烟和焚烟的胜利。早就准备扩大侵略的英国侵略者，悍然于次年6月派侵略军到中国广州，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此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情况下，徐继畲和其他抵抗派官员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义无反顾地担起了抵抗英国侵略的重任。

徐继畲在漳州刚刚上任，英国侵略军便进入福建厦门。汀漳龙道辖境距厦门仅15公里，就连徐继畲驻扎的漳州，距厦门也超不过20公里，而且水道相通，乘帆顺潮，瞬间可达。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漳州的守军仅有千余名，这些士兵因为平日薪俸低微，饷源不足，长期处于饥寒无人问，操练和赏罚无人管的状态。因此，兵无斗志，战斗力极低。就是因为布防不坚，致使“民心惶骇，一日数惊”，百姓们“多有逃亡之意”。

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徐继畲毫不气馁，下定决心与城共存亡。他对夫人续戴月说：“余督兵勇昼夜防守，志在与城共存亡……卿（你）且奈何？”他夫人回答得也异常坚决，说：相从俱死耳，此事何待商量！”他夫妇二人的浩然正气和宁死不屈的态度，反映出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就是因为徐继畲守城态度坚决，镇定自若，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使人心乃渐安贴”。

为了解决士兵的粮饷问题，他上书省城提出口粮加成六分，反对已经实行六分的地区再减成四分，并说：“头可断、议不可改！”作为下级官员，敢于这样顶撞上司，说明他为了抵抗侵略者，已经破釜沉舟，丢官丢命都在所不惜。为了鼓舞士兵们的战斗意志，徐继畲每夜登城，与士兵共守，而且还与守军士兵们“垂泪告语，勉其敌忾”。是的，他为了保卫本土，与士兵们谈话时声泪俱下，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每一位守城的士兵。

英军出于战略的考虑，攻陷厦门之后并未停留，而是继续北上，因而未占领厦门，也未进攻厦门附近地区。决心与英军一战的徐继畲也就未能与敌人交火。然而，从他的漳州的战备情况看，不仅说明他是一位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官吏，而且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可贵品质。

由于官职低微的缘故，当1836年以来清朝内部对于鸦片的严禁、弛禁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徐继畲并没有参与。到福建任职之后，他才进一步考察了本地区鸦片的进口、贩运和吸食情况，于1840年末作《禁鸦片烟论》一文。在文章中，他首先阐述了鸦片对中国的危害，说外国人每年因

贩卖鸦片而获利数百万，中国遭受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基于这种考虑，他坚决主张严禁鸦片。因此，有人说他在禁烟问题上，其态度和主张属于弛禁派，是没有根据的。恰恰相反，他认为弛禁会造成“堤防溃决不可收拾之势”，其害无穷。这说明他是反对弛禁的。不过，在禁烟的步骤上，他对道光皇帝批准的“一年期成”的意见，持不赞成态度。根据实际情况，他提出了10年禁绝鸦片的设想。他主张“宜先杜来源，次绝兴贩”。对于吸食之人，建议采取“先富而后贫”、“先豪滑而后良弱”的禁止办法。对于那些长期吸食、屡教不改的吸食之徒，他主张要适当地诛杀一些，藉以杀一儆百。

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不单单出于贸易的考虑，而且是它侵华政策的一个组织部分。因此，对待英国输入鸦片的态度，也就是对待英国侵略的态度。徐继畲坚决主张禁止鸦片，与他在漳州积极布防，誓死保卫中国领土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证明他是一位爱国官吏。

四、放眼世界 研究外国

鸦片战争的炮声，使徐继畲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特别是中国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的严酷现实，迫使他不得不突破常规，冷静地去思考他眼前的现实问题。

首先，徐继畲对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是极端痛苦的。他曾写道：“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逆夷所困，致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绥音 suì，意为退却）而曾不能挫